

匡亚明 主编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王晓毅 著

郭象评传(上)



賈小者賈貴者大者人所共知不得小矣故理
有至乎物有定極各足稱事其濟一也

大者無小無次者也苟有乎小大則雖大賤之與
翼註 卷一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郭象评传/王晓毅著.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4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匡亚明主编)

ISBN 978-7-305-06005-2

I. 郭... II. 王... III. 郭象(252~312)—评传
IV. B235.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75317 号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典藏版)

郭象评传(附向秀评传)

王晓毅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

(南京大学校内 邮政编码:210093)

安徽省儒林图书有限公司 发行

网址:www.rulin.com.cn

三河市华新科达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开本 660×960 1/16 印张 31 字数 348 千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6005-2

定价:60.00 元(上、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

名誉顾问 陆定一 谷 牧 李铁映 陈焕友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工作领导小组

组 长 王霞林

组 员 任彦申 王国生 王斌泰 石启忠

韩星臣 洪银兴 冯致光

学术顾问 (按姓氏笔画为序)

丁光训 丁莹如 王元化 王朝闻

冯友兰 曲钦岳 任继愈 刘导生

刘海粟 安子介 孙家正

杜维明(美国) 杨向奎 苏步青

李 侃 吴 泽 何东昌 张岱年

陈 沂 罗竹风 赵朴初 施觉怀

钱临照 徐福基 袁相碗

席 文(美国) 唐敖庆 黄辛白

蒋迪安 程千帆 谭其骧 滕 藤

戴安邦 魏荣爵

主 编 匡亚明

终审小组 茅家琦 周勋初 林德宏

副主编 (按姓氏笔画为序)

卞孝萱 左 健 巩本栋 茅家琦

周 宪 周勋初 林德宏 洪修平

蒋广学(常务) 潘富恩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序

匡亚明

伟大的中华民族在长达五千年连绵不断的曲折发展过程中,像滚滚东流的长江那样,以磅礴之势,冲破了重重险阻,奔腾向前,现在更以崭新面貌,雄姿英发,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奇迹。产生这一奇迹有诸多原因,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勤劳、勇敢、智慧的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思维活动和对外交往以及抗击外来侵略过程中,逐渐创造、积累、发展了具有以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为核心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这是一种伟大、坚强的精神支柱,是我们民族凝聚力和生命力之所在,是历史留给我们所有海内外炎黄子孙引以自豪的无价之宝。

当然,和各国各种不同传统思想文化一样,在中华民族的

思想文化传统中,也是既有精华,又有糟粕,因而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对;一知半解、信口开河或裹足不前、漠然置之,也不对。郑重而严肃的态度应该是对它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的研究和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继承和弘扬这份瑰宝,振兴中华,造福人类。人类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就是在不断去粗取精、继往开来和改革创新过程中实现的。继往是为了开来,开来不能离开继往。民族虚无主义和复古主义,都是违背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的。

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新的继往开来迈向四化的关键时刻。继往就是继民族优秀传统之往,开来就是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来。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从广度和深度上进行系统研究,实现去粗取精的要求,正是继往开来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我认为这是中国各族人民,首先是文化界、学术界、理论界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但面对这一时间上长达五千年,内容上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传统思想文化,将从何着手呢?毛泽东同志早在1938年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这是很有远见而又切合实际的英明建议。从孔子到孙中山这两千余年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文化最丰富的时期,如果总结了这段历史,也就基本上总结了五千年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当然,基本上不等于全部。孔子以前和孙中山以后的情况,可以另行研究。因此,我认为首先最好是在时间上从孔子开始到孙中山为止,方法上采取

^①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522页。

《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形式作为实现这一任务的开端。这就是从这段历史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和各个学科(包括文、史、哲、经、教、农、工、医、政治等等)有杰出成就的人物中,遴选二百余人作为传主(一般为一人一传,少数为二人或二人以上合传),通过对每个传主的评述,从各个侧面展现那些在不同时期、不同领域中有代表性人物的思想活力和业绩,从而以微见著、由具体到一般地勾勒出这段历史中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总体面貌,揭示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主要内涵,以利于开门见山、引人入胜地批判继承、古为今用,也为进一步全面系统地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打下基础。自从毛泽东同志提出上引建议后,半个世纪以来,不少专家学者已从各个方面做了许多工作,但对全面完成这个任务来说还远远不够,还要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努力。作为“抛砖引玉”,本《丛书》只是这个继续努力所应完成的工作的一部分。《丛书》凡二百部,约四千万言,自1990年开始陆续出版,争取十到十五年全部出齐。

《丛书》所以用“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主要是考虑到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核心是生生不息的内在思想活力,而历史事实也反复证明,凡是在各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和学科中取得成就者,大多是那些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自觉或不自觉地认识和掌握了该领域事物发展规律的具有敏锐思想的人。他们取得成就的大小,取决于思想上认识和反映这些规律的程度如何。思想并非先验之物,它所以能反映和掌握这些规律,主要是通过社会实践和对前人思想成果的借鉴和继承。思想一旦形成,反过来在一定程度上又对实践起决定性指导作用。

韩愈说的“行成于思,毁于随”^①,列宁说的“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②,这些话,虽所处时代和所持立场不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性质也不同,但就认识论中思与行、理论(思想的高度概括)与实践的关系而言,确有相通之处,即都强调思想对实践的指导意义和作用。因此我们以“中国思想家评传”命名,就是力图抓住问题的核心,高屋建瓴地从思想角度去评述历史人物,以便对每个传主在他所处时代的具体情况下,如何在他所从事的领域中,克服困难,施展才华,取得成功,做出贡献,从思想深处洞察其底蕴。历史上各个时代富有思想因而能在有关方面取得成就的人,直接阐述自己思想观点的论著虽亦不少,但大量的则是其思想既来自实践(包括对前人、他人实践经验的吸取)、又渗透在自己创造性实践之中,集中凝聚在他自己的业绩和事功上,而没有留下论著。另一些人却只留下著作而无其他功绩,对这些人来说,他那些有价值的著作就理所当然地是他的伟大业绩和事功。如果论述一个人的思想而不联系他的业绩(包括著作),必将流于空洞的抽象;同样,如果只讲一个人的具体业绩而不结合他的思想活动,又必将成为现象的罗列。评价思想和评价业绩,两者不应偏废。而不断在实践中丰富和深化的思想活力则是经常起主导作用的因素,强调这个因素,引起人们的正视和反思,正是我们的主旨和目的。当然,思想和思想家,思想家和实践家,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不同概念,忽视这一点是不对

① 韩愈《进学解》,中华书局《四部备要》东雅堂本《韩昌黎全集》卷十二,第3页。

② 列宁《怎么办》,《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41页。

的。《丛书》的重点则是放在两者的联系和结合上。至于如何使两者很好联系和结合而又着意于剖析其思想活力,各占多少篇幅或以何种方式表达,则自当由作者根据传主的具体情况创造性地作出妥善安排。

自从人类历史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不仅全人类解放和发展有了划时代的明确方向,学术研究也有了更严密的科学方法,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根据这一科学方法,在研究和总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联系到《丛书》的撰著时,我认为下列几点应特别引起重视。

一、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实事求是贯串在马克思实际活动和理论研究中的主线,离开了它也就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只有切实掌握了客观情况,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前者为“实事”,后者为“求是”,二者相结合,就叫实事求是。事不实则非夸即诬。为了弄清情况,就必须对情况的本质与现象、整体与局部、真与伪、精与粗,作出区别、梳理和取舍,这样才能掌握情况的实质,达到“实事”的要求;然后进一步加以分析研究,找出事物本身固有的真相而非主观臆测的假象,并验证其是否符合人民利益和人类历史前进方向,是否反映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的发展规律,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判断,达到“求是”的要求。实事求是治学的基本功夫,是对每个传主的功、过、是、非作出公正评价的必要前提。不论古今中外,对历史人物过高或过低的不公正评价,大都由于未能认真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缘故。

二、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马克思主义学说就是批判的学说,而批判是为了继承、发展和创新。这就需要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既要继承发扬传主业绩和思想中的积极因素,

又要批判清除其消极因素。凡传主业绩和思想中体现了诸如爱国主义、民主意识、科学见解、艺术创造和艰苦奋斗、克己奉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即在符合历史前进要求的“立德”、“立功”、“立言”诸方面有显著成就等积极因素者,必须满腔热情地加以继承和弘扬,并紧密结合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之深入人心,蔚然成风;凡反映有诸如封建迷信、专制独裁、愚昧落后、丧失民族尊严和违背科学进步等消极因素者,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批判,清除其一定程度上至今尚起作用的消极影响,而消极因素经过彻底批判后可转化为有益的教训;凡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相混者,更当加以认真清理和扬弃,既发扬其积极因素又摒弃其消极因素。我们力求一点一滴、切实认真地探索各个传主思想和业绩中珍贵的积极因素,使之成为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从事的继往开来伟大历史工程的组成部分。

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是发扬学术民主、促进学术繁荣的正确原则和巨大动力。前者强调一个“齐”字,后者强调一个“争”字,是表示学术上平等、民主和自由的两种不同状态;前者突出的是统一与和谐,后者突出的是区别与争论;两种状态又统一于不断地相互促进和相互补充、转化的持续发展提高过程之中。“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原则体现在撰著评传时,应从“齐放”和“争鸣”出发,综合中外各个时期对有关传主的不同评价,吸取符合客观存在的对的东西,摒弃其违反客观存在的不对的东西,然后创造性地提出经过自己独立思考的、赶前人或超前人的一家之言。同时,对整个《丛书》而言,也有个共性、个性又统一又区别的问题。这就是一方面作者应把“实事求是”、

“批判继承”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几方面作为大家的共性(统一与共识);另一方面,对每部评传的立意、结构和行文(文体、文风和文采等),则主要是作者的创造性思维劳动和雅俗共赏的文字表达艺术的成果,是彼此的个性(区别),不宜也不应强求一律。评传作者都有充分自由去发扬这一个性,力求在对每一传主的评述中探索和展示其积极因素,使之和正在变革中国面貌的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实践融为一体,丰富其内容,促进其发展,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传主思想业绩的一般性诠释上。

我认为,以上三点大体上可以表达《丛书》所遵循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也不排除用其他思想和方法得出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感谢所有关心和支持《丛书》工作的单位和个人,特别是感谢《丛书》的名誉顾问和学术顾问。他们的热情关心、支持和指教,使《丛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更要感谢所有承担评传撰著任务的老中青学者,他们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作出了或正在作出对学术、对民族、对历史负责的研究成果。没有他们的积极合作,《丛书》工作的开展是不可能的。《丛书》副主编和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出版社,在制定《丛书》规划,约请和联系国内外学者,审定书稿以及筹划编辑出版等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辛勤劳动是《丛书》能按预定计划出版的必要前提。

现在《丛书》开始出版了,我作为年逾八旬的老人,看到自己迫于使命感而酝酿已久的设想终于在大家支持合作下实现,心情怡然感奋,好像回到了青年时代一样,体会到“不知老之将至”的愉悦,并以这种愉悦心情等待着《丛书》最后一部的

问世;特别盼望看到它在继承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珍贵遗产方面,在激励人心、提高民族自尊心和爱国主义思想方面,在促进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继往开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历史性伟大事业中,能起到应有的作用。我以一颗毫厘童心,默默地祝愿这一由一批老中青优秀学者经长年累月紧张思维劳动而作出的集体性学术成果能发出无私的熠熠之光,紧紧伴照着全民族、全人类排除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走向和平、发展、繁荣、幸福的明天!

热诚欢迎国内外同仁和各界人士不吝赐教,以匡不逮。是为序。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从社会政治与思想文化结合的视角,探讨了向秀、郭象的生平事迹及其学术建树,展现了魏晋之际玄学思潮六十多年发展变化的历史画面。向秀是魏末“竹林七贤”之一,被迫从山林步入朝廷,首创“性分”学说,开辟了以入世精神诠释《庄子》的新思路。郭象是西晋“元康名士”,以太傅主簿身份控制朝政,其《庄子注》堪称玄学理论的巅峰之作。其学术创见为:彻底消除宇宙本原论,破“君权神授”说,确立了个性的本体地位;人性由圣人与凡人两大类型构成,圣人之性以“因循”凡人之性为特征,而凡人则以实现个性为最佳境界;圣人治国的本质,是凡人(臣民)的“自治”。

A Brief Introduction

From the synthesis viewpoint of the politics and the thoughts, this book discussed the lives and theory contributions of Xiang xiu and Guo xiang , to unfold the tapestry of the Neo-Taoist philosophy history of more than 60 years in Wei-Jin Dynasties. Xiang xiu was a member of the Seven Sages of Bamboo Grove in the later stage of Wei Dynasty, obliged to come out to be an official of royal government, fabricated new theory “Xingfen” (individual nature) which bring out a new method to interpret the Book of Zhuang Tzu by inspirit of going into the society. Guo-xiang, a personage of Yuan Kang period, controlled royal government under the name of Taifu Zhubo. The Note Book of Zhuang Tzu is the zenith works of the Neo-Taoist philosophy, to eliminate the universe noumenon theory and the divine right of king theory, setting individual nature as and the Mortal, the Saint nature is obedient to the Mortal, however, the self-expression of the Mortal nature is a full development of personality; the essence of the Saint policy is the autonomy of the Mortal.

前 言

庄子以其深刻洞察力，看到了无法解决的人生悖论，尽管他没有明确提出“名教与自然”这一对立范畴，但如何在现存社会体制中获得个性自由，却是他关心的课题。然而，庄子并没有找到一条达到自由之境的路径：有时他力图超越社会体制的局限，通过“游心”，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有时他则试图通过“游世”，在与世沉浮中获得相对的自由。庄子在两者之间徘徊，不知所终。在思想探索的路上，他走得最远，经常孤身一人，面对永恒。他只是希望，万世之后，有一个大圣，能理解他的“吊诡”之言。

庄子逝世后，他的学说沉寂了数百年，复活在血腥的魏晋之际，竹林七贤的心中。嵇康、阮籍沿着《庄子》的游心之路，激烈反对社会体制，打出了“越名教任自然”的旗帜：嵇康愤起反抗，白白送掉了性命；阮籍借助虚幻的神仙境界，企图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在朝中抑郁而终。面对淋漓的鲜血，向秀“觉悟”了，他清醒地看到，在社会体制的铜墙铁壁面前，

个人的反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脱离社会的自由逍遥只能是幻想,沿着《庄子》指出“游世”方向前行,恐怕是惟一的出路。他不愿步嵇康后尘,到洛阳东市喋血,在朝廷与山林之间,无奈地选择了前者。

在混迹于西晋宫廷的日子里,向秀对《庄子·逍遥游》关于大鹏与小鸟的描述,有了超越前人的感悟。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意象中,竟然发现了本质的平等:“逍遥”是生命存在的最佳境界,而逍遥仅是本性的满足,如果满足了自己的本性,那么逍遥本身是没有任何差异的,犹如在金床上或木床上,睡着后的感觉是一样。从这个角度看,只要适合自己的本性而自我满足,那么不仅小人物与大人物,即使圣人与凡人,其逍遥也是没有差别的。向秀将这一发现上升为“性分”学说,刷新了思想界对“逍遥”的理解,融铸在其《庄子注》中。

向秀大约逝世于咸宁元年前后,此时郭象只有十岁左右,40多岁的年龄差距和社会地位悬殊,使两人无缘相识。如果扩大学术视野,从两人所分属的竹林名士与元康名士群体的历史发展看,其内在联系显而易见:向秀逝世后,山涛、王戎等竹林名士作为西晋政治当权派,一手扶植元康名士走上了历史舞台。郭象则是在元康名士主流派——贵“无”派的支持下,破土而出的。

传世的郭象《庄子注》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杰作。它不仅集魏晋玄学之大成,而且在魏晋南北朝思想史上,没有一本著作能从整体上超越它的份量。但这部巨著的真正的作者?却是个持续了一千多年的公案。《世说新语》说是郭象抄袭向秀,而《晋书·向秀传》则说是郭象发展了向秀。近代以来,学者们以向秀《庄子注》佚文对照现存郭象《庄子注》,基本上形

成了郭象发展向秀《庄子注》的共识,但由于向秀《庄子注》久佚,郭象究竟“借鉴”了多少向秀的成果,也许是一个永远解不开的谜。如果忽略向秀、郭象在传世《庄子注》中的著作权份额,从其它散见的佚文——向秀的《难养生论》与郭象的《论语体略》看,两人都是一流的大手笔。从积极的角度看,他们是魏晋解放运动中,《庄》学复兴接力赛的两位重量级选手。一部学术名著《庄子注》,将他们的名字永远连在了一起。

向秀与郭象都出身于平民,在门阀士族社会兴起的西晋时期,以个人杰出的才干与学术名声位居高官,并且都通过作《庄子注》,成为西晋时期两位最重要的玄学家。但是他们性格与处世方式不同,政治命运各异:向秀性格平和,习惯于低调处世,走向朝廷之路,实属不得已;郭象则性格外向,有强烈的人世情结,最终作为司马越亲信幕僚控制朝政。无论被迫还是自愿,他们都卷入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漩涡中:向秀“隐居”的河内郡山阳县,是洛阳之外的第二个文化中心,后来则“容迹”于西晋王朝的中枢机构任散骑常侍,参与国家重要决策;而郭象寄身的司马越的太傅府,则是永嘉时期真正的朝廷,他以太傅主簿身份控制朝政,“熏灼内外”。向秀、郭象与政治的密切关系,使他们的思想脉搏,必然随主流社会的变化而跳动,因此在他们思想演变的背后,是实实在在的魏晋社会的发展史。

向秀与郭象年龄相距 40 岁左右,时代不同,面临的生存困境和亟待解答的理论课题存在差异:向秀生活在从动荡走向太平的魏晋之际,需要论证如何将自由适合社会体制;郭象则生活在从太平走向动乱的元康~永嘉之际,亟需解决的时代课题是如何拨乱反正、重建社会秩序,这注定了他必定能在

《庄子》中发现向秀无法读到的“新意”：彻底消除了玄学前辈理论体系中“君权神授”的尾巴，解构了“圣人”和其背后的宇宙支撑点——“无”，否定一切宇宙本根和所有外在的决定者，确立了个性的本体地位，肯定了每个生命存在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其生存的独特方式。圣人不是超人，也不是哲学家，而是操持政务并获得实际成功的务实君主；圣人所拥有无限的智慧，仅仅表现在以无心态度顺应社会时势。由于社会时势的本质不过是臣民的共同意志，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体是臣民自己，而不是圣人。圣人治国的本质，是臣民的“自治”。

无论多么深奥的学问，都可以用简单的话语表达，可将向秀、郭象哲学创见概括为：向秀发现草民的快乐与圣人的快乐，没有质量差异；郭象则进一步看到，圣人背后即无神力，也不作为，天下大治的关键，竟然是让臣民各行其是。

不要小看向秀、郭象的简单发现，他们的学说可谓石破天惊。汉唐之际中国个性解放运动过程不是上升直线，而是一个“抛物线”，郭象玄学则是这个抛物线的顶端。西晋元康～永嘉之际，在元康名士的推动下，新兴士族社会自由放达之风走向了极致，并为此付出了国破家亡的惨重代价。渡江南下创建了东晋王朝的元康名士吸取教训，一变为儒道双修的“中兴名士”，保持儒家伦理的社会规范功能，因此从东晋开始，儒家思想开始呈上升趋势，而玄学个性自由开始受到抑制，这种态势在南朝时期则因寒族上升与皇权复兴而继续强化。由此可见，郭象《庄子注》的创作时间，正处于传统儒教跌至低谷而玄学个性自由达到顶点的时代，故出现如此大胆怪论。前无古人，后不见来者。